

# 当民间信仰成为一种文化遗产

萧放

在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今天,民间信仰自然应该纳入非遗范畴,但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对纳入非遗的民间信仰内容应该有所选择。笔者认为,民间信仰的传统性、伦理性与濒危性是应该考虑的文化标准,对于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的重建在总体上要持积极扶持的态度,以实现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目标。

## 民间信仰在中国历史社会中的境遇

民间信仰是民众对待自然社会的一种精神态度,“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民间信仰对象广泛,大体可分为祖先信仰、神祇信仰与鬼灵信仰等。所有的民间信仰从根源上看都是要维护人的生命的正常过程,如祈福与消灾避祸,虽然具体的表述方式可能千差万别。

民间信仰长期传承于民间社会,它虽然也不断地成为上层社会精神信仰的来源,但总体上看,民间信仰因其原生性与民众生活的密合性,以及存在状态的弥散性,始终与上层的精神信仰有着显著差异。从历史情况看,愈

是儒家信仰坚定的人,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愈不宽容,他们以“辨风正俗”“移风易俗”的旗号,整顿、改易乃至摧毁不符合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民间信仰。

其实,民间的信仰传统很难改变,如江南著名神灵蒋子文地位的浮沉就是典型事例。据《搜神记》记载,蒋子文本来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小县尉,死后被老百姓奉为神。吴王曾下令禁止,结果发生大火,吴王只好承认他的祭祀。后来蒋子文的地位发生了几次反复,但民间信仰依然顽固。

近代以来,“文革”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打击尤为剧烈,而今天该是我们正确认识民间信仰的历史与社会文化价值的时候了。

##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

如果说此前民间信仰被当做迷信或落后的意识形态,认定它是社会进步的阻力或国家安全的威胁的话,那么在全球化时代,在文化多样性的理念下,民间信仰的合理性开始得到重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有5项内容,其中第4项是“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

和实践”。这就是针对民众的精神信仰所做的概括性表述,由此民间信仰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范围。

在这样的境况下,是不是任何民间信仰都可以作为遗产而任意传播呢?笔者认为要慎重对待,对其范围应该有所限定。根据非遗的概念,我认为目前要重视的民间信仰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性:

一是传统性。传统性是构成文化遗产的要素,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构成民间信仰传统的时间大约在三代以上,也就是经历了百年左右的信仰传承才是稳定的传承形态,任何当代新生的民间信仰都不能纳入其中。这样既体现了民间信仰的遗产价值,也有效地防止了过度商业性对民间信仰体系及其存在状态造成的扰乱与危害。

二是伦理性。不是任何的传统化都能上升到遗产的高度,我们在继承中要有选择,对于那些有益于大众身心健康并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积极效用的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才有资格成为遗产。就民间信仰来说,它是一个复杂的构成,民间信仰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都很鲜明,能够团结社会与调整精神的民间信仰应该属于良善的范围。对于具有良善的伦理特性的民间信仰,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发挥这类民间信仰在道德规范训诫与调剂民众精神方面的能力。

三是濒危性。我们传统的民间信仰在近百年的历史挫折

中,已经或正在面临着大面积消失的危险。我们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对这类民间信仰现象优先抢救保护。要通过认定与保护活动,唤起人们对民间信仰的重视,将良善的民间信仰融入当下生活。

今天的社会虽然与传统社会血肉相连,但毕竟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较大的改变,传统的民间信仰也面临着蜕变与更新。在目前民间信仰获得宽松环境的情况下,有可能泥沙俱下。我们要特别警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下,一些不良之人利用尊重民间信仰的幌子,行敛财、危害社会及人民生命安全之实。

## 如何正确对待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本来是民众自发产生的信仰,它的传承与发展本来应该依靠民众自己解决,我们的民间信仰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压制后,其信仰空间大部分被摧毁,信仰时间曾被长期取消,至今不时受到负面评价。以首都北京为例,清代北京曾经有3000多座庙宇,几乎每条街道都有自己的祭祀场所,人们按照祭祀传统岁时祭祀。而现在,除因宗教政策与民族政策所保留的雍和宫喇嘛庙、广济寺、广化寺以及几座天主堂、清真寺外,北京剩下的寺庙大部分被拆毁,民间信仰的空间自民国时期就已经部分损毁或变为工商活动场所。更重要的是,人们关于民间信仰的知识系统被截断,甚至根除。笔者认为,对待民间信仰应注意两个

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营造一种宽松的信仰文化氛围,让民间信仰获得必要的社会尊重。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民间信仰,对于良善的民间信仰在温暖人心、调节社会方面的文化功用视而不见;围绕寺庙所进行的增强社区联系、活跃社区文化的庙会,也曾经被管理部门长期禁止。当然,这些情况在近年来已经出现明显的改变。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民间信仰是民众自我精神调节的方式,只要符合一般伦理与国法,不影响非信仰者的正常社会生活,外界不必干预。

二是应该提供必要的时间与空间,为民间信仰的重建提供便利。如在时间上,我们可利用传统节日重建岁时祭祀传统,如清明节的祭祖活动、中元节的慰藉亡灵活动,春节、中秋节对天地的自然崇拜等。在空间上,应该在城乡主动恢复与开放传统庙宇,让现代民众有一个表达情感意愿的精神空间。如北京的东岳庙曾经是北京的“万神庙”,人们的生老病死的疑惑都可得到解决,这样的城市公共信仰是有积极效用的。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普通中国人的信仰空间不由中华传统信仰来填充,就意味着给外来的宗教与文化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任其发展,中国人就会失去自己的精神品格,这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京剧的程式作为一种具象的规范,其形成有深刻的文化原因。它依据角色、行当的特点要求,进行规范、完整、细致与夸张的美感舞台行动。从“徽班进京”到“同光十三绝”,从“四大名旦”到“四大须生”,京剧经过200多年的继承发展,逐渐形成了观赏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程式美。它非常重视外部形式上的表演(即程式化),经过千锤百炼的一举一动,既要注意外形塑造,又要使动作表现出人物的潜台词。

京剧艺术的唱、念、做、打都有自己的程式,在京剧的舞台上没有纯属自然形态的原貌出现,生活中的自然形态都须按照美的原则予以提炼、概括、夸张、美化成为节奏鲜明、格律严谨的技术格式,在舞台上表现出来。京剧的一整套艺术程式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观众知其“形”而解其“意”,比如舞台上其实没有门,却可以通过程式化的表演使观众知道门的存在。不过,现在有些人认为程式是陈规陋习,是对艺术创作的束缚,推崇程式就是反对改革创新,因此他们以打破程式为时髦,以取消程式作为改

革创新的业绩;另一方面,有很多人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有丝毫改变,要“原生态”保留。

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提出的“移步不换形”

理论不仅是他自己改革实践的总结,也是所有京剧艺术家成功实践的总结,“移步”就是改革发展,“不换形”不是指表层的形态而是指京剧的本质形态不能变。“移步”是手段,“不换形”是目的,京剧表演就会僵化凝固,失去活力,通过“移步”,京剧的程式能够更加灵活多变,更具有可塑性。但是,京剧表演的程式是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和丰富纷繁的社会生活中经过高度提炼的表演语言,在“移步”的同时,还必须“不换形”,才能保留京剧艺术的精髓及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京剧丰富的表演程式在表现剧情和刻画人物形象时是取之不尽的,运用程式的方式方法也是多变的,只要遵循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必一成不变,无视社会的发展,也不需全盘推翻,改革而改革。其实不仅京剧艺术应如此,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该如此。

## 在传承中「移步不换形」

王美玲

## 杭州为老字号“建档”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岳德亮)胡庆余堂、王星记、张小泉、孔凤春、都锦生、西泠印社……在西子湖畔扎根的老字号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并积累的档案材料,既是老字号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凭证和依据,也是杭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决定为老字号详细“建档”,以抢救和保存即将失传或受到破坏的老字号技艺,提高老字号企业核心竞争力。

记者从杭州市政府办公厅公布的《关于加强杭州老字号档案工作的意见》中了解到,详细“建档”的老字号企业包括杭州市范围内已获得“中华老字

号”“浙江老字号”“杭州老字号”称号以及正在申报各类老字号称号的企业。根据杭州市政府的规定,老字号企业要制定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并积累的档案材料,既是老字号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凭证和依据,也是杭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对于处于重组、联合、兼并、合资、转让、歇业等改制过程中的老字号企业,也要从维护企业利益、保护职工合法权益、为社会留存史料的角度,把档案处置与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统一考虑、统一安排。

近日,由浙江省温岭市太平戏剧曲艺家协会演出的越剧大戏《梅花谣》成功首演,吸引了许多市民前往观看。太平戏剧曲艺家协会成立于2002年,经过几年的积累,在越剧界已小有名气,他们不但继承发扬了越剧艺术,也丰富了当地市民的文化生活。

黄晓慧 摄

## 宁夏花儿唱进校园

本报讯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系列活动之一,近日,一场名为“花儿的灵动与时尚”的演唱会在宁夏大学音乐学院举办,让乡土味十足的非遗项目走进了青春校园。

花儿是流传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高腔山歌,曲调高亢悠扬、歌词淳朴清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格。校园传承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之一。今年,宁夏教育厅、文化厅联合制定下发了《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计划实施纲要》,计划通过教育部门和文化的合作,让更多年轻人倾听、亲近花儿,了解、接

受花儿,同时发现和培养一批热爱民间艺术、有志于花儿演唱的专门人才,让宁夏优秀民间艺术代代相传。

演唱会上,既有宁夏民间花儿艺人带来的原汁原味的山花儿,也有现代歌手创造的将传统民歌与时尚音乐元素结合的现代花儿,更有大学生演唱的略显青涩的青春花儿。

此次活动是由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宁夏大学音乐学院共同主办的,双方还计划在宁夏大学成立传承保护基地,培养回族花儿演唱和回族乐器演奏、制作的专业人才。

(艾福梅 张亮)

广东梅州是全球客家人最大的聚集地,千百年来积淀了绚丽多彩的客家文化,梅州山歌就是客家文化艺术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余耀南是该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近日他向笔者一行讲述了自己与客家山歌的不解之缘。

年过七旬的余耀南风采依旧,表演起出口成歌、即席应对、双手舞打竹板等山歌绝活,让人叹服。从艺60年来,余耀南创作了300多首山歌和曲艺作品,先后20多次出国演出,被誉为“客家山歌的宝贝”。

余耀南1938年生于马来西亚,两岁时跟随母亲回到了家乡梅州大埔县青溪镇长丰村。他自小酷爱山歌,母亲和他多爱唱山歌的村民是他的启蒙老师。余耀南11岁的时候,便因山歌演唱天赋突出被学校的宣传队挑中,常常下乡表演。此后的初中、高中阶段,他一直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并开始学习自己创作山歌,成为山村里的小名人。20岁的时候,余耀南遇到了他艺术生涯的重要老师张照英,就是这位左手残疾、曾经靠乞讨为生的小学教师,教会了他创作山歌和五句板的基础知识,并成就了后来他在即兴山歌、打竹板上的造诣。

作为山歌一代名师,余耀南一直十分注重山歌的传承和发展。无论是名噪一时的阶段,还是在文化大革命起伏跌宕时期,或是在退休安享晚年的时刻,

他都没有放弃过对山歌事业的执着追求,一生以搜集山歌原始资料、创作和演唱山歌、培养山歌艺术骨干为己任。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余耀南就着手培养山歌文艺骨干和接班人,至今收徒近500人,其中不少学生是从我国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澳大利亚、

泰国等国家慕名而来的。“只要有人诚心学山歌,我都会毫不保留地传授,因为只有人才百花齐放的艺术才是真正成功的艺术。”余耀南说。

2006年,梅州客家山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余耀南被命名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自此,余耀南更觉肩上责任重大。当下,山歌人才青黄不接的现状让他忧心忡忡,“我时刻都在琢磨着,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山歌,并爱上山歌”。目前,他正筹划着到一些小学举办山歌培训班,将精力倾注在培养娃娃歌手身上。

谈及山歌如何才能突破发展瓶颈,余耀南表示,应在传统的唱腔基础上,大胆进行改革创新,融入时代气息,并结合舞蹈艺术等,以吸引更多儿童和青少年爱上山歌。此外,政府要重视,并为之搭建更多发展平台。

让人欣慰的是,“客家山歌之乡”梅州十分重视山歌文化,已连续多年举办国际山歌文化节。“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我相信客家山歌一定会传遍四海。”余耀南说。



## 上党八音会的时代变迁

本报记者 杜洁芳

近日,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奏厅,热热闹闹地进行了一场上党八音会的专场演出。随着乐手们的激越吹奏,整个演奏厅的气氛异常活跃。

上党八音会是一种民间吹打乐,流行于晋东南地区。据考证,明清时期民间已传有各种八音会曲谱,民国时期仅山西晋城一地乐户就有170户之多。2006年,该项目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国古代依据制作材料的不同,将乐器分成8个类别,“八音会”则是以各种打击和吹管乐器合奏的一种民间吹打乐,主要乐器有鼓、锣、镗(小锣)、笙、唢呐、管子等,后来增加了小镲、梆子、胡琴、笛子等乐器。上党八音会乐器有文场、武场之别,文场有笙、笛、箫、笛、笙、唢呐、管子等,武场有鼓、锣、镗、梆子、胡琴、笛子等。上党八音会乐器有文场、武场之别,文场有笙、笛、箫、笛、笙、唢呐、管子等,武场有鼓、锣、镗、梆子、胡琴、笛子等。上党八音会乐器有文场、武场之别,文场有笙、笛、箫、笛、笙、唢呐、管子等,武场有鼓、锣、镗、梆子、胡琴、笛子等。

18世纪末,一些民间的音乐爱好者为了和乐师等职业乐人相区别,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音乐活动形式取名为八音会。上个世纪,上党八音会是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凡是有朝山进香、秧歌、社火、婚丧嫁娶、祝寿、庙会、祭祀等活动,都有八音会伴奏和助兴。今年70多岁的黄保泰年轻时参加过山西晋城当地的八音会,他说:“八音会的乐手一般都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有的甚至都不会看简谱,学艺过程全靠老艺人的口传心授。”那个时候的八音会完全是义务服务,不收取任何报酬的。”上党地区民间八音会原先是自娱性质的乐社组织,受人雇邀为婚庆吹打是后来的事。过去八音会以打坐场为主,吹奏内容大都是民间小调、梆子戏、落子戏曲牌和选段等。八音会的人为红事吹打时,穿一件很简易的红外褂——将一块红布从中间开个豁口,头从豁口中探出,前胸后背各有一片红布,无领无袖——因此当地称其为红衣行。

后来,红衣行从自娱性质的乐社逐渐演变成半职业性质的民间鼓坊类型的吹打班,不过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这种吹打班和乐户有着严格的区别。该项目的

国家级传承人黄一宝曾经的师傅就是乐户,他说:“乐户和红衣行分得很清楚。在人们看来乐户行的地位比较低,他们一般以家庭为单位,以吹奏为生,代代相传。红衣行则在有邀约时组建,平时仍耕田种地。而且红衣行只办红事,不办白事。它们的民间俗称也不同,称红衣行为‘吹打’,称乐户的班主为‘科头’,称红衣行的班主为‘挽头’;乐户只能与乐户联姻,红衣行则无这种限制。”

据多位老乐手回忆,八音会最热闹的时候当属庙会节日庆典来临时,因为各个八音会都知道这是一比高下的时刻,尤其在几队八音会碰到一起时,大伙儿都会拼命争斗一番。这时观众也会奔走相邀,争看激烈的吹打。打击乐手施展浑身解数,竭尽全力,打得惊天动地,打小镲小锣的还要不断翻跟头。最累的是吹唢呐,除了要口衔铡刀,两端悬挂水桶外,还要头顶水碗、双肘也放水碗,有的会当场累得虚脱。

山西晋城群众艺术馆馆长魏一飞接触八音会已有10多年,在他看来,虽然与一些濒危项目相比,上党八音会还不至于传承后继无人,比如在晋城农村,婚丧嫁娶邀请八音会助兴的传统一直



至今仍活跃在山西民间的上党八音会